



引用格式:杨晓.以赛亚·伯林历史观的双重维度[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9(2):50-58,71.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2.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2-0050-09

以赛亚·伯林历史观的双重维度

The two dimensions of Isaiah Berlin's historical view

杨晓

YANG Xiao

郑州轻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以赛亚·伯林基于对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和历史叙述中关于主观和客观问题的探究,构建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和历史观。面对个人主义在20世纪四面楚歌的荒凉处境,伯林试图以对个体自由意志的重申和对决定论的拒斥来力挽狂澜,对行将消失的自由主义和个体自由予以强调和提倡,从而彰显个体自由在其历史观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与卡尔·巴特菲尔德争辩道德判断的走向和基点,伯林强调历史解释不能漠视和压制作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而仅仅把重心放在对外在力量发生作用的探寻之上,以此重构其历史观中的道德判断的原则。伯林对个体选择自由与个体责任的强调,作为主线贯穿其整个历史观,构成了其历史观的两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

以赛亚·伯林;
自由;
责任;
道德判断;
历史观

收稿日期:2017-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ZX060);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基金项目(2013BSJJ060)

作者简介:杨晓(1981—),男,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道德哲学。

伯林的历史哲学和人性论建基于一种历史观,侧重于人类历史、文化和有着自身特征的现代人性论与个体的选择自由。其温和的历史主义立场的核心是对作为整体的且具有独特表现力的、基本的生活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和历史性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充满温和色彩,即通过移情的想象力和一定程度上的洞察力,达到对不同的人类文化的理解。换言之,伯林的这种温和的历史观根植于对生活在历史长河之中的个人所必然拥有的、程度大小不同的自由,同时又与其多元论思想相契合。

一、伯林温和的历史观

作为自由的捍卫者之一,伯林以其自由主义思想和对西方观念史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其对自由概念的两种区分仍然在影响着大量的自由主义的研究者;同时,其对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的探究及其观点也仍然是理解此类范畴的重要参照。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伯林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事实上,从伯林弃哲学而投入观念史的研究开始,他相继发表了《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刺猬与狐狸》《现实感》《历史与理论:科学的历史的概念》等文章,对历史学家的工作与责任、历史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散论看似凌乱,但实则有相关主题贯穿其中。同时,伯林所推崇的个体自由更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间,并以此为基点构建起具有鲜明特色的温和历史观。

伯林的历史观构建首先是对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和历史叙述中主观和客观问题的探究。伯林认为,对处于历史长河中的个体而言,人们会不可避免地做出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种种自由的选择。与这种选择自由相呼应的是责任。伯林反对那种认为鉴于人们所生存的处境中存在着许多个体无法决定和影响的因素,个

体的选择不能成为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重点的观点。伯林认为:“……历史学家(与侦探、法官和陪审团)试图确定也能够确定的是:什么东西构成了这些可能性;这些界线的划分方式标志着可信的历史与不可信的历史的界限。”^{[1]134}但是,在历史学家叙事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偏差。由于视角上的差异,一个历史学家与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对同一历史事件甚至会做出大相径庭的叙述。针对于此,伯林认为必定存在着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所无法抹除的人们共享的某种基本的假定。“这种共同的基础正是被正确地称作客观性的东西。它能使我们认同别人与别人的文明,将他们视为本质上是人道与文明的。”同时,伯林也明确指出,主观与客观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这条界线又毫无疑问地存在。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主客之分的根源正是伯林历史观所探讨的第二个问题: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对伯林而言,把历史等同于科学,并以此为基础试图为历史学构建一组特殊的概念和范畴是荒谬的。他认为,“历史作品虽然不像想象性的文学作品,但是它肯定无法逃脱在自然科学中被恰当地斥为无理由的主观性的东西,甚至无法逃脱直觉(就这个词的经验意义而言)”^{[1]157}。与深信存在某种可以破解事物奥秘的次序或关键要素的自然科学不同,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却指出人类历史中存在着太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因此是一种异于自然科学的“不精确”的学科,其所依赖的是某种程度的具体性、暧昧性、含糊性、暗示性、生动性等。囿于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历史学家并不能通过把握全局而对过去进行重构。伯林指出,“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告诉我们世界上真的发生过什么……他们所揭示的是具体性格、具体的系列事件或历史形势中详细而精确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是作一幅传达某种独特经验的肖像,

而不是一张能够作为一类相似结构的概括性符号的X光照片”^{[2]23-24}。但令伯林感到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并没有注意到或者故意忽视自然科学与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之间的差异,并不遗余力地试图把应用于科学范畴之上的方法和模式扩展到历史学之中,希望在其中找到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问题的模式或定律。

伯林历史观所探讨的第三个问题体现在他对事实和理论与阐释之间的差异性的描绘,以及对历史学家所特有的富有想象的洞察力的研究。对伯林而言,对历史事实客观的记叙与对它们的阐释之间虽然并不能极端地划出界线,但其间最基本的区别还是存在的。正如我说“张三在吃饭,而李四在玩游戏”,这是一种关于事实的陈述,而非一种理论或一种解释。毫无疑问,事实和理论与阐释之间的界限通常是宽泛和模糊的,但是在一定的意义上,与阐释、理论、假说、视角相对的,由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必须在变化着的观点看来是不变的,否则毫无历史真相可言。因此伯林重申:一边是事实,另一边是看法和阐释,中间的界限可能模糊,但界限确实存在。^{[2]28}然而,单纯事实的简单叙述并不能形塑历史,即便赋予它们可以通过科学加以检验的假说,它们仍然构不成鲜活的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机械的方程式或一堆松散的历史材料。“只有把它们置于具体的、有时模糊的,但一直不断的、丰富的、丰满的‘实际生活’——主体间的、可直接认知的经验连续体——的基本结构中才行。”^{[2]29}伯林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恰恰在于其对于事实和现象的叙述,即对历史中所曾经发生的具体系列事件或历史形势中独特的东西的描绘,目的是使读者能在所谓的“具体性”中把握当时的环境。这种对事实的描述和叙述的能力除需要谨慎的观察、具备正确的知识外,还需要历史学家具有

力和生活的经验所构成。通过使用这种富有想象的洞察力,历史学家可以进入其他的异己的文化内部,从而更好地理解 and 叙述这种文化。

如果我们把对伯林的历史观的解释限定在历史主义的一般意义上,那么人类的知识将会被我们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所迷惑。此外,如果在一般人类价值或目的上去理解个体,那么我们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究其原因,我们不但要面对历史上所存在着的令人目眩的多元样态的生活形式,而且也必须按照这些多元样态的生活方式来对其进行理解。同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自身所遵循的生活形式也面临着无数难以理解的困境。而这些经常使我们面临困境的风俗习惯,恰恰是塑造我们自己的历史、道德判断和自我理解的源头所在。为了更为恰当地理解伯林的历史观,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其对历史观所阐释的内容和特征上。伯林描述他的历史思想之时正值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目睹了当时文化中个人意志和个体自由逐渐被剥夺,由此滋生了某种恐慌和危机意识,有鉴于个人主义在20世纪四面楚歌的荒凉处境,伯林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试图以对个体自由意志的重申和对决定论的拒斥来力挽狂澜。作为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伯林在当时无可厚非地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旗手和代言人。随之伯林又陆续完成了《刺猬与狐狸》《现实感》等一系列阐述其历史观的文章,其在对形而上的决定论的批判之余,亦对行将消失的自由主义和个体自由加以强调并提倡,从而彰显出个体自由在其历史观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柏林历史观中个体自由意志的彰显

伯林在探讨历史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或演讲稿中经常会提及他所关注的自由意志和责任的

问题,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人类在不同的时代所一再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伯林认为,自由和责任的问题是人类所面临的基本的、永恒的、没有确定性答案但不可避免要对之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预示了人性的巨大可能性,也代表了历史与经验的巨大可能性。个体自由和个体选择是人的内在需求。虽然我们可能处于令自身和他人满意的状态,但内心依然希望可以做出与此时状态迥异的选择。这正是伯林拒斥决定论的理由。他与决定论的争论,表现在关于历史、自由、个人责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解方式上的分歧。伯林认为,一切形式的决定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终极而言,个人的选择自由是一种幻想;人类能够作出不同选择,这种观念史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无知之上的。”^{[1]122}因为这些决定论的目的是对个人责任观念的消解,他们认为,如果世界历史起因于可以识别的力量的作用,而不是起因于自由的人类意志与自由选择或很少受其影响,那么就必须根据这些力量的演化,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合适的解释。显然这种历史观把历史的发展变化完全归因于不受个体影响和控制的实体,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比个体更大的实体之上而全然隐没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正如柏林所说的:“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被抛入一个特殊的精神、社会、经济环境中,我怎么可能不选择现在的所作所为呢?”^{[1]128}他认为,那种把个体行为和个体影响与责任完全抛掉的观点,削弱了个体自由选择的余地和意义。

个体选择自由毫无疑问在伯林的历史观中占据核心地位。伯林认为,自由的信念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人类有时候做出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并不是物理学或生物学所能接受的那类因果解释所完全能说明的。^{[1]137}同时伯林也意识到,如果这个信念是一种必要的幻觉的话,那么因其太深刻与太普遍,以至于人们已经

感觉不到它是幻觉了。伯林认为,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道德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存在着无数可供人们选择的选项,人们在面对这些互不相容甚至相互冲突的选项时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择。“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直接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他目的之牺牲的世界。的确,正是因为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中,人们才给予自由选择以那么大的重要性。”^{[1]241}

伯林曾感叹:“想过上平静生活的人,在20世纪真是生不逢时。”^{[1]62}伯林在其生活的时代,历经了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和1940年代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从而意识到善与善之间并不是相互兼容的,因此他认为最能符合现实和人性的唯有价值多元主义。伯林深谙人类生活中多元道德和价值并存的事实,因此对于决定论者所渴求的完美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所有的矛盾都将会被解决,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和谐一致的——伯林是坚决拒斥的。这种完美社会理念是自柏拉图以降直至黑格尔为止,哲学家们不断强调和宣称的。伯林认为,这些决定论者所谓的“完美世界”“不仅仅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它在概念上也不够圆融”^[3]。历史学家的任务仅仅是告知我们世界上曾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并不能发现普遍适用的历史模式,并不能推测过去和预知未来。但是决定论者为了建构或构造出他们所谓的“完美社会”或“完美世界”,就不得不对事实进行削足适履的加工,这种行为必将对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伯林也不完全认同同时代的另外一位自由主义捍卫者卡尔·波普的观点。波普认为,决定论者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既脆弱又难以成立,其对历史的预知是有限的。针对这种“对历史的有限的预知”,伯林补充道:“人类

历史不断变革的原因在于明确地实现人们自身不断变化的欲望、新的需求、新的目标、新的观点,以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前景;这也是反对声称可能发现社会变革的严格的规律的观点的主要意见之一,它的必然结果就是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决定论。”^[4]伯林进而从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指出:(1)历史决定论是同我们大部分基本的道德和政治的概念和价值不相容的;(2)存在着对艺术的和特定的、包含人类行为和思想不利影响的历史性理解的不可复归性^[5]; (3)决定论仅仅是限于自身主张不能从我们所处的立场中得到论证。伯林与波普之间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波普坚决主张他所批评的对象是一般的历史主义,而伯林宁愿称之为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变种——历史决定论。其次,波普意欲把历史主义刻画为“开放社会”的永久的“敌人”,伯林则警告人们这些“形而上学”立场的弱点和危险。事实上,伯林的一生都在与这些思想家们作斗争,尽管他有所保留,却提出了大量新颖的、富有创造性的观点。

伯林在强调个体选择自由和与之相关的责任时,对于决定论者像描述日出、大海等自然现象那样描述凯撒、克伦威尔、希特勒的行为抨击最甚。因为这种对历史的刻画消除了历史人物所应担负的责任,从而使个体从责任的重负下逃脱出来。“一旦我们将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从个体的肩膀上转移到制度、文化、心理或生理因素的因果性或目的性的作用上,那么诉诸我们的同情心或历史感,或期望那种完全不偏不倚的理想——这种理想也许的确不是完全能实现的,但对这种理想,有些人是不是比别人更接近一些呢——还有什么意义呢?”^{[1]131}这也是为何伯林三番五次地对近代历史演进过程中“非个人解释”日益高涨的原因。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一书中,伯林提及19世纪以来历史解释的重心逐渐地从对个体的重视转移到对

制度力量影响的偏重。此后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一书中,伯林又再次归纳了当今流行的历史理论,认为可区分为人格的与非人格的两种:前者着重于探讨特殊个体的决定性影响,后者则认为根据人的意图而进行的解释完全是起源于自负与愚蠢的盲目混合。伯林早先曾以浪漫史学与理性史学之别说明历史的演变,后来则以更加鲜明的人格的解释与非人格的解释加以区分。由此可见,伯林意欲彰显的是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不可或缺性,而与个体选择的自由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个体对历史所负责任的不可推脱性。

三、柏林历史观中道德判断的重构

卡尔和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学家在记叙和传达历史事件时不应掺杂道德判断。对此,伯林并不认同。他指出,个人的动机对历史事件的发展影响甚大,“任何人只要谈论的是人,就注定要考虑其动机、目的、选择以及专属人类的特殊人类经验”^{[1]29},个人的选择与个人的自由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并不能被简单地忽略。此外,伯林认为,虽然个体并非全知全能,但不能以此为由消解个体因自由的选择而应该担负的责任。因此,对于巴特菲尔德所谓的“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对有资格言说的东西还要谨慎言说;因为证据总是不足的,我们能够作的至少是不做判断,既不称赞也不谴责;所谓罪犯不过是被卷进逆流的泳客,漩涡是他们控制不了的”^{[1]149}这种悲观论点,伯林不以为然。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说明。

首先是柏林对“人类的困境”的疑虑和驳斥。由于巴特菲尔德把人视为脆弱的生物,所以他认为把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诸多灾难的责任施加于人类的肩膀之上是荒谬可笑的。伯林认为,巴特菲尔德所谓的“人类的困境”是众多

纷杂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些因素是导致人类“知识的有限性”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伯林认为“僵死的现实主义者、基督教悲观主义者是正确的”。诚然,在历史演进中,充斥着吹毛求疵、相互揭露,在道德上或情绪上对异己的生活方式的排斥等邪恶的场景。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对教条式的褊狭进行纠正的观点可能会把“人类的困境”作为人类历史的终极核心因素,导致把责任转嫁到个体的脆弱与无知之上,从而消解个体的责任。这种对个体责任的消解将会导向“认识一切即是宽容一切”的立场:认识越少,我们便越没有理由进行公正的谴责。^{[1]150}伯林认为这种观点推至极致便会导向对历史客观性的完全拒斥,“历史客观性……这个概念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用于衡量事物的最终标准,根据其定义本身不能为任何别的东西所衡量”^{[1]153}。与之相反,虽然我们的某些判断是相对的和主观的,但是如果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判断,如果客观性从原则上而言是我们所完全不能理解和认知的,那么“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两个词汇将不会形成对比,同样都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伯林认为,萨特菲尔德所谓的“人类的困境”倾向于消解个体的责任,而且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会造成重大的困扰,甚至于对历史主义的偏见和道德主义的辩护和谴责都无法成立,并因此使道德中立的观点归于虚无。

其次,伯林从个人的选择自由的角度分析了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伯林之所以支持历史学家不应回避道德判断的观点,是基于他对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个人自由选择的信念的重要性的判断。伯林相信个体在历史演进中有其作用,选择、责任、自由等观念都根植于我们的人性之中,并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对历史进行解释就有必要对个人行为作出交代和评述。例如,伯林认为历史学家在描述重要的革

命时,应当追究某些人物对革命的失败应负的责任,如此才可能正视人类的责任及其在有限范围内拥有的真正的自由。

但对于波舒哀、谢林、黑格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思想家而言,个体仅是构成民族、文化或文明的抽象的因素,仅是为着特定的目的而人为地抽象出来的“元素”“方面”“环节”;个体脱离他们所组成的集体便失去了实在性,正如事物的颜色、形状和价值一样,只有具体事物的“元素”“属性”“样态”或“方面”。对于这些思想家而言,“人的行为的真实的原因并不在于个体生活的特殊环境,而在于这种极其多样的生活与其自然及人造环境间的无所不在的交互关系。人做他们所做、想他们所想,主要是作为‘阶级’整体的不可避免的演进的一种‘功能’。从这种观点出发可得出如下结论:对历史与阶级发展的研究,可以独立于组成它们的个体的传记而进行”^{[1]110}。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探究个体选择与个体自由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思想家愿意诉诸种族、民族或文明而非个体,他们认为“由生者和死者、我们的祖先和我们尚未出生的后代组成的大的社会,比任何单一的造物都更有目的性,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大目的的小碎片”^{[1]111};他们渴求被胁裹进比个体更大、更具体的实体之中,这种实体负载了个体的价值并成为个体目的的工具,而个体肩上所担负的责任将被其所隶属的实体所统摄。因此,对他们而言,个体因其自由的选择而需要担负相应的责任是无稽之谈,是被“理性所拒斥的”;同时也是混乱的、肤浅的乃至幼稚的妄自尊大。所以,承认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无疑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个体选择的自由更是一种幻想;人们对事实的无知与愚蠢的自大,导致他们相信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而那些以万能者自居的,指导人们应该这样或那样去行动、应受称赞或贬低、值得人们赞同或谴责的

主张,都是建立在这样的预设之上:“他们生活的领域并非是完全受规律决定的,不管这些规律是形而上学的、神学的、抑或表明了科学所揭示的概率。”^{[1]111}这种预设被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类的思想家所拒斥。他们认为,只有人们在对事物本质极端无知的境况下才会做出称赞与谴责、提醒与鼓励、谅解与宽容等道德判断。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愈深刻,人类的自由和责任的领域就愈狭窄。同样,当我们理解物的本性就是知道你的真实要求是什么和如何实现它之后,责任或内疚、正确与错误的概念将会成为空洞的记叙词汇。因此,“称赞和谴责是无知的产物”^{[1]124}。

与此同时,这些诉诸卡尔所指称的大写的抽象的“人”的思想家认为,如果世界历史并不受自由的人类意志与自由选择的影响或很少受其影响,而是起因于可以识别的力量作用,那么,对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合适的解释就必须依赖于这些力量的演化。因此,实体而非个体要承担责任的倾向就逐渐加大。但是在伯林看来,一旦我们将自由选择及其应该担负的责任从个体转移到制度或文化等实体之上,那么诉诸我们的同情心或历史感或对完全不偏不倚的理想期望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并非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是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的。而个体在历史中有其作用,他也必然要为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负责,因此我们并不能像描述洪水、地震、日出等自然存在物那样去描述希特勒或斯大林。我们可以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褒贬,但是必须基于中立的立场并有事实根据。由此可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个体自由和责任,而且这些自由和责任也是历史解释中不可或缺的。

最后,伯林认为历史学家并没有义务对读者进行道德说教。伯林认为,历史学家所使用

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会渗透着带有评价性力量的言辞,把这种言辞从他们的语言中剔除出去是异常困难的。虽然客观、不带偏见、不动情等品质是我们对历史学家应具有的美德之要求,但是在伯林看来,历史学家与我们普通人相差无几,因此若要求历史学家比普通人更具有非人性化的特质就极不合理;同时,历史学家也无需公开表明他们的道德判断,他们并没有义务告诉读者什么对其有益、何者对其有害。而他们在描述历史事件时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可能是完全中性的,“它们全都携带着道德含义”^{[1]126},因为“任何微小的事情都能传达价值判断,即传达我们正常的、很少被注意到的道德与心理状态”^{[1]156}。所以,不论历史学家使用何种语言即便是使用中性语言传达历史事实,也是在传达着自己的伦理观念。因此伯林断定:“避免道德说教的方式只能是采取另外的道德观点,而非是完全抛弃道德观点。”^{[1]162}

伯林通过对巴特菲尔德所秉持的道德判断的悲观态度进行辨析式的批判,在强调个体选择自由的立场上重新构建了历史学家道德判断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他也通过语言分析彰显历史学家在记叙史实的过程中难以把道德意蕴剔除出去。通过对个体选择自由与个体责任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历史解释中个体的力量和历史语言中所内蕴的道德含义的分析,伯林构建起独特的彰显个体自由的历史观。

四、柏林历史观中的个体自由与社会因素

伯林的批判在为20世纪自由主义给出石破天惊的一击的同时也招来了相当程度的批评。在众多反对声浪中,尤以左派历史学家卡尔的回应最为有力。卡尔和伯林都是英国当代著名的俄国专家,且两人对马克思都有独到的研究。二者对立的焦点是历史解释的立足点究

竟是建立在个体自由之上,抑或是建立在社会因素之上。伯林认为,卡尔无疑是一个决定论者,走的是孔德主义路线。而卡尔认为,伯林通过批判决定论所建构起来的历史观,不折不扣是非科学的、充满原始时代色彩的。卡尔对伯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卡尔批评伯林所主张的历史学家应对历史上重要的人物进行道德批评(关于这一点,因为和本文主题关联较小,在此不多论述)。伯林对此则以其一贯不愠不火的态度回应,他表示自己从未主张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做道德批判,而只是强调“历史学家也和其他人一样,都在使用一些带有评价色彩的语言;若要他们在他们的语言中将这一类的语言全部排除,不啻于要他们去做一件极端困难而自我愚弄的事情”^{[1]53}。伯林常常以这样略带狡猾的中立方式回应他的对手,总是尽力强调自己的不偏不倚的治学立场:既不赞成什么,也不特别反对什么,而只是中肯地提出些什么。

其次,卡尔批评伯林直言决定论是个错误,认为这只是伯林排斥历史学家使用因果关系的规律来研究历史:“以赛亚·伯林反对解释人们行为的原因,其所持的理由是这些行为乃出于人的自由意志。”^{[6]123} 卡尔认为,所谓决定论是相信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或多个原因,并且事情不能不如此发生。“因为我们对人格的了解原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下:一切事物都有其原由,其中大部分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人心里能够建立一个古今前后连贯的图案、足以供人动作的向导。除非我们承认人的行为是受制于一些大致可以确定的原因,我们简直没有生活的可能。”^{[6]122-123} 卡尔极力主张历史的任务就是依照因果关系来排列过去事物的顺序。卡尔指出,原因和随自由意志而来的道德责任事实上根本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如果你认为他没有责任,这并不是说你认为他的行为没有

原因。”^{[6]138} 卡尔认为,人类一切行为既是自由的,同时又是被决定的。卡尔认为这样就解决了伯林所谓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逻辑关系难题,但在笔者看来,真实的问题其实并未解决。因为诚如卡尔所言,它取决于我们采取何种立场。当伯林从人本主义或人性论的立场出发强调个体自由立场时,他就放弃了决定论的观点,因为决定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赋予历史意义的人的存在价值。

对于卡尔的批评,伯林首先表明他从未说过决定论是错误的,也从未否定使用因果关系来研究历史。他强调尽管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十分有限,但在关键时刻出于个体自由意志下的行动往往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伯林重申历史必须留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而决定论的问题在于它超越了因果关系的使用范畴,奢望找到世界上所有事情包括未发生之事的因果关系,其以伪科学的方法延伸历史,实属荒谬可笑至极。伯林认为,决定论视域下的历史不过是某种既定的悲喜剧,剧中每一角色都不是在自己构想出来的剧本里,念着属于自己的台词,根据已经写好的剧本行动,如此,所有历史上的人类在决定论视域下不过是某种巨大力量下的玩物,丝毫不异于受操控的牵线木偶。这自然是伯林所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历史并非一场结局注定的计划,而是如赫尔德岑所言:“历史全是即兴创作,全是意志、全由临场发挥,既无界限、亦无既定路线。”^[7] 伯林相信人类行为和精神世界虽可能由他们的阶级地位、种族、性别和传统文化所塑造,然而作为一个个人,人们仍然保持着道德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人类免受某些决定论因素的影响。

最后,卡尔将伯林主张以“人类的意向”来解释历史的观点称为“恶王约翰式的历史观”^{[6]54-55}。伯林认为历史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人的素质和行为,卡尔则反对伯林如此治

史,将其嗤为传记性的偏见与幼稚的想法。诚然,卡尔并不反对历史事实中有关于个人的事实,但他强调历史所关心的对象不应是个人单独的行为和动机:“历史事实所注意的是一个社会中个人彼此间相互的关系和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是从个人的行为而来,但往往产生和行动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6]64} 卡尔相信人不只是纯生物而是社会形塑之产物,因此,历史的价值取决于整体社会力量。卡尔的这种贬斥并不合理,因为在个体与社会因素之间,伯林毫无疑问会选择前者,但他并非主张“个体生来就具备不受束缚的自由意志”,同时也不是绝对的个人意志论者。伯林在倡导个体自由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个体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社会或群体的影响:“这样的看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个人责任的信念。责任的程度有多大,亦即自由的、可以选择的备选方案的可能性的领域有多大,将取决于一个人对自然与历史的解释,但绝不会一点没有。但是这种观点却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否决,他们沉浸在形而上学或科学的决定论中,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终究而言,所有事情或至少是大多数的事情,都可以归结为阶级、种族、文明或社会结构的作用。”^{[1]110} 由此可见,伯林认为个体自由的空间依赖于对“自然”和“历史”范围的划定。同时,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也指出,面对诸多的终极价值,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择,因为人们的生活与思想最终是依赖于基本的道德范畴与概念,无论如何,这些概念和范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他们的存在和认同感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因素。因此伯林所秉持的并非自由主义的个体自由,而是历史主义的个体自由,他虽从未否认社会和共同体对个体所造成的影响,但其目的仅在于尽力彰显个体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的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已。

此外,伯林还通过对卡尔历史观的回驳,将历史解释的重心重新又拉回到人的身上:“要描述人类行为,却对于人的性格、目的、动机略而不谈,永远只是矫饰失真且过于严苛的做法。”^{[1]89} 伯林重申,如果历史学家忽略了个体动机和动机形成的背景,忽略了人类思想和想象的错综复杂,忽略了人类世界乃至对人类本身的看法,便无法把握历史的本真。伯林认为,卡尔的历史观等于是主张一件事越是非个人化,个人癖好在历史中的角色就越是幻妄,越远离客观的真理与事实^{[1]51}。伯林认为这种历史观可能无中生有地引出一些问题,也等于宣布了对“不可变易的事件模式”的信仰,使人卸除个人责任的负担、放弃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而滋生出非理性的激情、产生非理性的狂热活动。

五、结语

伯林认为,与人类的语言一样,人类的历史也是多方面的和多样的,所以,总存在着许多人类历史而不存在着单一的历史。因此,对于形而上学历史观所主张的观点——历史只有一种价值,因为它有一种本身便具有价值的目的;这种目的构成了其存在的依据,并因此为每一历史状态和历史事件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每一历史状态和历史事件都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先定的,由此整个历史过程也是必要的;这一过程具有明确的模式,即历史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历史现象都需看作向着历史目的的实现而迈出的一步——伯林持拒斥的态度。因为在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模式之下,人们选择的自由将最终成为一种幻想。伯林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即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并实行自由制度的社会,其能否存在取决于个人承担责任与进行自由抉择

(下转第71页)

-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200.
- [4] 曹南燕.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J]. 哲学研究,2000(1):48.
- [5] 程现昆. 科技伦理研究论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3.
- [6]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65.
- [7]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下[M]. 孙周兴,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893.
- [8] 奥特弗利德·赫费. 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
德[M]. 邓安庆,朱更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20.
- [9] 韩东屏,欧阳康. 疑难与前言:科技伦理问题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0.
- [10] 汉斯·约纳斯. 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M]. 张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7.
- [11] 陈昌曙. 哲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54.
- [12] 廖小平. 伦理的代际之维——代际伦理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

(上接第58页)

的可能性。如果人们对自己道德力量的作用持悲观甚至怀疑态度,或是把自己看作是可以被不告知的模式或政治操控者的傀儡玩物,那么人们便不可能去捍卫自由,而必将成为决定论主宰下的牺牲品,失去自己作为人所拥有的珍贵美好的自由意志。伯林对决定论进行批判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们认清楚决定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相信唯有个人勇敢地承担责任以及因抉择所可能引起的焦虑不安,人们才能享有自由,才能去维持、建立、捍卫难能可贵的自由社会。

参考文献:

- [1] 以塞亚·伯林. 自由论[M]. 胡传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2] 以赛亚·伯林. 现实感[M]. 潘荣荣,林茂,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3] 以塞亚·伯林. 扭曲的人性之材[M]. 岳秀坤,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7.
- [4] BERLIN Isaiah. Reply to Robert Kocis[J]. Political Studies,1983:392.
- [5] BERLIN Isaiah.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M]. London:Pimlico,1998:129.
- [6] CARR E H. What history[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61.
- [7] 以塞亚·伯林. 俄国思想家[M]. 彭淮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2.